

顾问／郑子瑜 周振甫 胡裕树

主编／郑子瑜 宗廷虎 副主编／陈光磊

中国修辞学通史

【明清卷】

李熙宗 刘明今
袁震宇 霍四通 著



(吉)新登字02号

中国修辞学通史 明清卷

李熙宗 刘明今 著
袁震宇 霍四通

责任编辑:张景良 责任校对:李 枫 崔秀英 封面设计:王劲涛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5印张 6插页 340 000字

发行: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500册 定价:28.00元

印刷:长春新华印刷厂 ISBN 7-5383-3613-3/K·85

《中国修辞学通史》序

郑子瑜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1932)第十二编“结语”论述中国修辞学发展的经过,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萌芽期,是内容杂乱时期,自上古至19世纪末;第二是修辞文法混淆时期,自《马氏文通》出版(1898)以后至“五四”时期;第三是修辞学说竞争期,指“五四”以后至《发凡》出版的那一年(1932)。虽然陈氏只是回顾自古至今中国修辞学的研究情况,并概略地将之分为三个时期,在他的思想中可能还没有形成中国修辞学“史”的明确意念,但他对中国修辞学说的不断进展早就看到了的。所以《发凡》的“结语”又有这样的话:“我以为一切的科学都不能不是时代的,至少也要受时代的所要求所注重及所鄙弃所禁忌的影响。何况修辞学,它的成事成例原本日在进展的。成事成例的自身既已进展,则归纳成事成例而成的修辞学说,自然也不能不随着进展。所以修辞学的结论,实际可以随时不同。世界上既然没有永远不变的成例,自然决不会有永远不变的修辞条理。”

这一段话给我的启示实在太大了。我自忖:修辞学说既然不断地在变迁,应该有人起而研究它,让大家知道新旧修辞学说的历史联系,这对本学的发展和进步,当是大有裨益的,虽然在《发凡》出版之前,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岛村泷太郎(即岛村抱月)所著的《新美辞学》(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2),在其第二节中已提到中国美辞学的变迁,但只提到《诗》的六义以及简略地介绍《文心雕龙》、《文则》、《沧浪诗话》、《读书作文谱》……等书的内容,并未有史的联系,只能算是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发端罢了。1923年3月和1924年3月,胡光炜在《国学丛刊》先后发表了《中国修辞学史略》和

《中国修辞学史》，前者先是阐释修辞与修辞学的区别，继而略述西洋修辞学的变迁，最后则是中西修辞学特点的比较，简直是文不对题；后者才简要地论述了春秋战国时期修辞理论的概貌，也不成其为史。

自此以后，中国出版的一些修辞学著作，有一章或一节提及修辞学说的演变的，如徐梗生的《修辞学教程》（广益书局，1933）第六编有《从东洋修辞学之演变看》一节，但他所举中国历史上有关修辞学的著作，只是因循岛村抱月所举的，所论也极简略；又如章衣萍的《修辞学讲话》（天马书局，1934），其第六讲也讲到《中国修辞（学）著作小史》，但内容也毫无新意；还有陈介白的《新著修辞学》（由《修辞学》增订，世界书局，1936），总论部分虽然也谈到《修辞学的变迁》，但作者自谓他的修辞学是直接参考岛村泷太郎等的有关著作而来的，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说了。只有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能建立自己的修辞学体系，他的修辞思想是自发的，而其“结语”又能给人以“史”的启示。

回头说到我受到《发凡》的启发之后，虽然稍稍有“史”（指修辞学史）的概念，但如现实是如此的残酷，多少年来，我都无法在学术机构任职，而非学术性的工作又迫得我喘不过气来，读书写作只能在业余，故虽著稿有年，决不敢梦想能著述成书。1964年，我幸运地得到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来到早稻田大学的语学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兼研究员，大学当局接受六位教授的建议，为开设“中国修辞学特殊讲座”，让我来讲授，参加听讲的有实藤惠秀教授、大矢根文次郎教授、阵内宜男教授、提留吉教授（兼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原田正己教授、松浦友久教授（他们都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除松浦外，差不多都是年近古稀的老学者，所以只能说是互相研究、互相讨论罢了）。

在讲课的过程中，实藤惠秀教授曾经起立发言：“《发凡》所提到的修辞论，有古有今，如果能够加以补充整理和评述，该有多大的意义！”于是前述《发凡》“结语”所提示的话，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便下了决心，要对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下一番研究的工夫。适逢由全日本各大学中国语学科教授和讲师所组成的“中国语学研究会”将于5月30日在早稻田大学举行关东区例

会，请我演讲，我便答应在会上讲《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以下简称《变迁》）。我说：“谈到中国文学的变迁，有中国文学史；谈到中国哲学的变迁，有中国哲学史；谈到中国史学的变迁，有中国史学史；谈到中国文学批评的变迁，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只有中国修辞学却直到现在还不曾有‘史’。所以我要作大胆的尝试，在诸位汉学家的面前先来谈谈中国修辞学的变迁。”我又说：“也许有人以为至今为止，比较有系统和比较像样的中国修辞学著作，还是寥寥可数，又哪里有修辞学史好写呢？但是，我们如果把衡量修辞学的尺度放得宽一些，了解任何学术，必先有它的萌芽时期，然后逐渐发育，逐渐生长，才有茁壮和发扬光大的一日；那么对于上古以来，那些文论、随笔、杂记、诗话、经解之类的著述中有关修辞学的话，即使是片言只语，也可看作是中国修辞学史的宝贵资料。”自从接受邀请到上台演讲相隔只有三星期的时间，我日以继夜，搜集资料，埋头赶写，每晚只能睡三、四小时，那年我只有四十八岁，身躯还可支撑得住，终于能在演讲前脱稿。我一讲竟讲了约二万五千言，耗去了听众大半天的光阴。因为是急就篇，疏误和遗漏的地方在所难免。《变迁》于1965年由早稻田大学出版后，竟先后得到著名学者陈望道、郭绍虞、胡裕树等逾分的推许，（注一），使我更觉惭愧。可惜我虽曾受到《发凡》的启示，以后才能写成《中国修辞学史》，但却没有机会上过陈望道老师一节的课，亲聆他的教诲，至今仍引以为憾事。

《变迁》出版后，直至80年代始有周秉钧的《汉语修辞研究简史》（刊《古汉语纲要·修辞篇》，湖南人民，1981）、唐启运的《汉语修辞学的过去和现在》（中国修辞学会会刊，1981）、周振甫的《中国修辞学简史》（刊张志公主编《现代汉语》下册，人民教育，1982）、李维琦的《古汉语修辞学简史》（刊《修辞学》第五章，湖南人民，1986），都是很有斤两的。

不久，我回到新加坡，为了生活，仍须干那非学术性的工作，但我还是利用业余时间，自所能看到的报刊以及所能买到和借到的书本去探索，如果发现只言片语是有关修辞学史的资料，我便及时抄了下来，或是复印下来，一张都不让它遗失，静候时机，希望将来能有编写成书《中国修辞学史稿》的

一日。即使没有第二次在学术机构任职的机会，甚至终其身都无法写成，我也愿意白干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钟，才肯罢休。（《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首都师大，1994）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1978年，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为了要创办外语学研究院，来函聘请我为“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讲座教授，我便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把十余年来所搜得的一大叠、一大叠资料，携至日本，加工整理，同时继续寻找补充的资料，不分寒暑，不论昼夜，也不问周末和假日，只是躲在研究室里，或将参考资料带回宿舍，“一生懸命”（日语“拼命”之意）地读和写，直到1980年离职时还不能写成，只得将资料复印携归新加坡，继续撰制，终于1981年9月间脱稿，得到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教授为撰序文，复得到《复旦学报》主编蒋学模教授的介绍，将书稿寄至上海教育出版社，直到1984年中才出版。

1984年秋，我幸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郑德坤教授的邀请到香港来任客座高级研究员，直到今年才改职称为名誉高级研究员。当年读书风气极好，拙著《史稿》以属第一部中国修辞学史，故初版平装，25,000册，精装5,000册瞬即售罄；后来读书风气大变，出版社以征订册数不足的原因竟直到初版十一年之后（即1995）才肯再版。在这之前，我曾于1990年授权文史哲出版社，在台湾翻版，略加增订，易名《中国修辞学史》。

因为是第一次尝试撰写中国修辞学史，无可借镜，而我又长年僻处海外，找资料比较困难，所以虽然编写了近20年，仍自觉有不少的疏漏，只能算是一本稿子，希望有人能继起而为之，以补拙著《史稿》的不足。1986年6月，我到上海来参加学术会议，并应邀在复旦大学、华东师大和上海师大讲演《编写〈中国修辞学史稿〉的体会》，其间，易蒲和李金苓一连几晚到招待所来和我讨论修辞学史的编写问题，并告诉我他们正在编写《汉语修辞学史纲》一书，希望我能提意见，并为撰写序文。我提议《史纲》可以特定的要项为纲目，别树一帜，独创体系。后来看了他们寄来的原稿，觉得《史纲》的特色：（一）能勾勒出修辞学几个部分的发展史，如修辞理论的发展史，文体

风格论的发展史等；(二)兼及按文体区分的几个分支理论的发展史，如诗的修辞论发展史，文的修辞论发展史，戏曲的修辞论发展史，小说的修辞论发展史等；(三)研究方法上点面结合，并突出重点总结汉语修辞学史独特的发展规律(见拙序)。其中谈到戏曲和小说的修辞论所占的篇幅不少，足以补拙著《史稿》之不足。(《史纲》，1989年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史纲》出版之后的一年(即1990年)，袁晖和宗廷虎主编的《汉语修辞学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书的撰稿人除了宗、袁二人之外，尚有戴婉莹、李金苓、谭全基。它的特点，正如胡裕树教授的序文所说：(一)分期法能吸取各家之所长，先分古代和现代两个阶段，古代再分为七个时期，现代又分为1905年至新中国建立以及1949以后两个时期；(二)写作体例上采用对有关学者与专著结合而立论的方法，在史料发掘和评析上，采用史论结合，夹叙夹议，详古略今，以及观点、材料和谐统一，正确地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等原则。我要补说的，是此书现代篇所论极为详尽，足以补拙著《史稿》之未备。看了此书的“后记”，才知道此书的几位作者，是受我在条件大不如人的可悲情况下，竟能排除万难，搜集资料，无所依傍地首创四十余万字的中国修辞学史的精神所鼓舞和激励，才下了决心，编写这一部《汉语修辞学史》。他们真可以说是有志之士！

稍后有周振甫的《中国修辞学史》问世(商务印书馆，1991年)，此书的特色，据本书《当代卷》所说：一、分期概括性强。所分五个时期，较其他几部同类史书的历史分期跨度要大得多，又有坚实的理据。二、对各时期修辞学的发展情形及其特点的概括，都显得十分清晰。三、史料丰富而翔实，如仅清代篇所论到的作者，就有七十三家之多，为同类著作所不及。周氏有关修辞学史及修辞学的著作，尚有《中国修辞学简史》以及《诗词例话》等，颇有声于时。

还有修辞学的断代史、以及研究修辞学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史，也许可说是修辞学史的分枝吧，单是复旦学人所撰的，就有宗廷虎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浙江教育，1990年)和吴礼权的《中国修辞哲学史》(台湾商务，1995

年),二书都有其特色,而且也都是首创之作。前者胡裕树的序文以及李运富的《简评》(湖南师大学报1991年第四期),指出书中所引述的一些修辞学史料是首次披露的;又从书中所举史料证明:中国现代修辞学应是起于1905—1918,而不是一般的修辞学著作所说起于“五四”。吴礼权是宗廷虎的博士生,而宗则是陈望道、胡裕树的高足,所以我为吴著所作的序文说,“吴礼权先生么,算来已是第三代了。”

至于单篇有关修辞学史的论文,除了前文所举的,可能还有不少,可惜我身居香港,有机会拜读的不多,未能尽述,但我知道单是复旦学人所写并已发表的此类著作,便有数十篇,再看看此多卷本《中国修辞学通史》的著作人阵容,足证复旦的修辞学研究队伍是强大而又肯努力笔耕的(其中有半数以上是陈望道的高足),也无负于前校长谢希德教授欲把复旦办成修辞学研究中心的期望。我们可以说,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由首创而至于繁荣,完全是得力于《发凡》的启示。

现在说到这多卷本《中国修辞学通史》的酝酿以至编写成书的过程。1991年1月,复旦老校长,完整的中国修辞学体系的创始人陈望道诞生100周年前后,复旦语法修辞研究室主任宗廷虎为了发扬陈望道老师的修辞学,建议和我联合主编《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以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并填补这一空白。(上文说过,《发凡》的“结语”启发我去研究修辞学史,但陈氏本身似乎还没有“史”的明确意念,现在应该补充一句:“而‘史’的意义自在其中”,所以宗氏给我的信,还有“以实现望老的遗愿”的话。)这实在令人感动,我立即表示同意。宗氏向吉林出版社张景良提出,得到社领导的支持,同意出版。不久,宗先生拟出了撰写计划与各卷大纲,和我斟酌修订之后,乃于1992年初印发给复旦有关同仁,征求意见,并确定各卷的作者。其后出版社张满隆、张景良正副社长二次来复旦,与编写组开会及签订合同,我都不在,胡裕树先生曾与会并发表谈话。几年中撰写组同仁开会讨论多次,为统一思想做了大量工作,我只参加了会议一或二次,又于1995年来校校阅了部分稿件,其余的事,大都是偏劳宗先生去处理,或来信和我商

量决定。在这之前，我怕宗先生负担的事太多，应付维艰，要求陈光磊先生担任副主编，负担一部分统稿和审稿的工作，幸得陈先生应允，使主编组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令人感激！

《通史》各卷的作者如下：第一卷（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陈光磊、王俊衡；第二卷（隋唐五代宋金元卷），宗廷虎、李金苓；第三卷（明清卷），李熙宗、刘明今、袁震宇、霍四通；第四卷（近现代卷），宗廷虎、李金苓；第五卷（当代卷），吴礼权、邓明以。

依照我们和出版社所签订的合同，原须于1996年10月脱稿，但因其间有部分作者患病，或有特殊的原因，未能如期完成，后来经过全体撰写成员的努力，有的还带病拼搏，终于使全部稿件得以在今年秋天完成，这是值得庆幸的。又序文对于《变迁》和《史稿》惨淡经营的经过写得略嫌多了一些，以致内容便没有篇幅可容再多提了，但我以为我当时如果知难而退，则中国修辞学史的首创以至于后来繁荣和进步的局面，便要退后一段时间了，所以叙述惨淡经营的经过比简介内容更加重要，希望读者能谅解这一点。最后，我还要在此一提的，是我曾于上述几本修辞学史相继出版之后，在《修辞学习》发了短文，希望有人奋臂而起，撰写第一部的《中国修辞史》，得到袁晖教授的热烈响应，写了《时代呼唤着修辞史的诞生》一文，在《修辞学习》（1995.1）发表。我们从他和宗廷虎教授合编的《汉语修辞学史》看来，他是挑得起时代所赋予他这一艰巨的使命的。

临末，复旦校领导对此多卷本《通史》编写工作的支持，各卷撰稿人的通力合作，以及吉林教育出版社与吉林省出版局的大力襄助；定此书为社、局九五重点选题，列为百种精品图书之一，后又获悉此书被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列入“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尤其是出版社正、副社长张满隆、张景良（兼任《通史》责任编辑）和发行科科长于辉诸先生，曾先后来复旦与编写组举行联席会议，签订合同，推动各项工作，使《通史》得以顺利出版，我和宗廷虎、陈光磊三人，谨在此表示由衷的谢忱！但因我身居香港，集稿时又适在病后，以致未能来沪与宗、陈二先生同时审定全稿，疏失之处，实

难以辞其咎，深望读者不吝指正。

1997年9月25日郑子瑜序于香港

（注一）见林兴仁《心灵的沟通——记陈望道与郑子瑜两位修辞学者的相重》（载宗廷虎编《郑子瑜的学术研究与学术工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郭绍虞《语法修辞之学与语义学的关系》（刊《中华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胡裕树《〈汉语修辞学史〉序》（刊《汉语修辞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

（注二）见谢希德《〈名家论学〉代序》（刊宗廷虎编《名家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1990二次印刷）

总 论

宗廷虎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修辞学作为文化底蕴深厚的一门传统学问，同样源远流长；它是我们的一宗丰富而宝贵的学术遗产。中国修辞学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对其形成发展进行多角度地、系统地、动态地考察和研究，从而对中国修辞学的历史进程作出描述，并探讨其中的规律，这就是我们撰写这部《中国修辞学通史》的意图所在。这里谨就修辞学史的一些基本理论、中国修辞学史的特点及规律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修辞和修辞学，修辞史和修辞学史

只有正确理解什么是修辞和修辞学，才能对什么是修辞学史有个恰当的认识。

什么是修辞？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说：“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①作者又进一步解释说，这里所说的“语辞”，包括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所谓“调整或适用”，指的是在“材料配置定妥之后，配置定妥和语辞定着之间往往还有一个对于语辞力加调整、力求适用的过程；或是随笔冲口一恍就过的，或是添注涂改穷日累月的。”②这里明确指出：“调整或适用”语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需经过仔细修改润饰的；一种是“随笔冲口一恍就过”，即时完成的。不论哪种情况，都在于求得语言的表达须适应题旨和情境。所以修辞就是运用语辞以求适应题旨情境。

什么是修辞学？修辞学就是研究修辞现象，探讨恰当运用语辞以适应各种各样题旨情境的学科。不论是古代修辞学还是现代修辞学，无不都是在总结了各种修辞规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修辞是在言语交际中进行的，言语交际必然包含交际的双方，既包括言语表达者，也包括言语接受者，因此：第一，言语表达者在修辞时不能不顾及交际对象，而是要把言语接受者的接受因素考虑进去，使自己运用的修辞技巧能更好地为对方所理解和接受，从而产生好的修辞效果。第二，言语接受者在接受信息时，也要考虑对应题旨情境，正确理解对方运用修辞手法所表达的信息，然后作出反馈。因此，修辞学既要研究表达修辞，也要研究接受修辞。不但要着眼于表达一方的研究，也要重视理解一方的探索。其实，我国古代修辞研究，重视阅读，重视鉴赏和理解，这是一个优良传统，例如孟子就曾说他“知言”，还提出了正确理解诗的“以意逆志”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概括出“六观”说：“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朱熹主张读诗更为重要的是要领会它的言外之意。^③对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应该进行深入的总结。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对这一问题曾经有过论述：“写说……从头就以传达给听读者为目的，也以影响到听读者为任务的。对于听读者的理解，感受，乃至共鸣的可能性，从头就不能不顾及到。……对于夹在写说者和听读者中间尽着中介责任的语辞，自然不能不有相当的注意。看它的功能，能不能使人理解，能不能使人感受，乃至能不能使人共鸣。”^④这是从写说者的角度，提出写说者从一开始就应该考虑到听读者的接受效果问题。陈望道是现代修辞学史上，较早提出要重视听读者接受的学者之一。他还进一步强调：修辞学“最大的功用是在使人对于语言文字有灵活正确的了解。这同读和听的关系最大。”^⑤这些论述，对不重视理解和鉴赏研究的论点，是一次廓清。

修辞学如果着重研究写说者表达的一方，称为表达修辞学；如果着重研究听读者理解的一方，则称为理解修辞学。不论是表达修辞学还是理解修辞学，都要关顾到交际的全过程。西方修辞学注重研究理解修辞学的经验，值

得我们重视。

什么是修辞学史？顾名思义，修辞学史就是研究修辞学这门学科自古迄今发生、发展的历史，如何演进、变化的历史。修辞学史以修辞学为考察和研究对象。中国古代由于种种原因，修辞学的正式建立较晚，在修辞学正式建立之前，中国学人对修辞和修辞现象已有众多的评论，这种修辞思想和评论自然也是修辞学史的研究对象。

修辞学史的研究既然是修辞学和修辞思想、修辞评论，那么修辞学、修辞思想和评论的范围有多大，修辞学史的研究范围当然就应该有多大。郑子瑜在《编写〈中国修辞学史稿〉的体会》一文中，就深有体会地说，他在寻找修辞学史的资料之前，就是以《修辞学发凡》为据，先“弄清楚修辞学的范围”，再着手研究的。我们认为，多数修辞研究者主张修辞学必须探讨修辞理论、句句篇章修辞、修辞格、语体（古代称为“文体”）、风格，有的认为应该包括修辞的理解等，意见是对的。那么古往今来有关上述几方面的论述，也都应该是修辞学史研究的范围。

修辞学史研究中，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必须区分修辞史和修辞学史的界限。郑子瑜一向很强调这一点。他在《编写〈中国修辞学史稿〉的体会》一文中，曾列专节予以探讨，专节的小标题即称为“修辞史与修辞学史”，他说：

将各时代诗文中的修辞现象，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史的叙述，夹叙夹议，以明修辞现象的变迁和进化，是修辞史；将各时代的修辞理论（也就是修辞学），作史的叙述（或评论），以明修辞思想的萌芽、成熟以至于发展的经过，是修辞学史。（《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第276页，首都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

修辞史研究的是修辞现象或修辞手法的演变发展史，修辞学史研究的是修辞思想、修辞评论以及修辞学的演变发展史，两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研究后者要对前者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甚至要建筑在前者的基础之上。但它们

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即研究对象不一样,研究方法也存在着差异,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二、修辞学的学科性质和修辞学史的研究

修辞学史的研究对象既然是修辞学,所以进行修辞学史的研究,就必须对修辞学的学科性质及其研究方法,有一个恰当的认识。陈望道早在1935年的《语言学和修辞学对于文学批评的关系》一文中,就指出修辞学和语言学、文学批评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到了60年代,他又不止一次地进一步指出:“修辞学是介乎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一门学科。”⑥“修辞学介于语言、文学之间,它与许多学科关系密切,它是一门边缘学科。”⑦

根据望道先生的论述,我们在《修辞新论》中作了发挥。指出:首先“修辞学属于语言学范畴”,它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第二,“修辞学是一门多边性学科”,是“介于多门学科之间的边缘性学科。”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修辞学研究的是语言运用的规律,它离不开语言因素、语言材料。现代修辞学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以语言为本位”。修辞学作为语言学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应该是无疑义的。但是,它与研究语言内部结构规律为主的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等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又判然有别。修辞学是语言学中一个特殊的门类,它建筑在上述诸多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基础上,是对语言众多因素综合运用的研究。与此同时,修辞学又与文学、美学、心理学、逻辑学、文章学、演讲学等学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在语言运用中,不论是信息的表达和信息的接受,与交际双方的文学素养、审美观点、心理状况、逻辑原理的把握等关系甚大。修辞学虽然是“对语文的评议”,⑨在评议时除了考虑语言材料因素外,还必须考虑文学、美学、心理学、逻辑学等众多因素,必须吸收这些学科的原理、原则,进行衡量,才能得出一个全面的认识。这是因为修辞学对语言语用技巧的评判,必须是多视角、多标准、多侧面的。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如语法学等与邻近学科虽也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不必象修

辞学研究那样，对其他学科的因素给予那么多的考虑。

修辞学与上述诸多学科的关系虽然密切，但比较起来，与文学中的分支学科文学批评的关系格外密切。对此，陈望道早就有了说明。他指出，修辞学与语言学、文学批评的关系都很密切，但比较起来，“又是修辞学和文学批评的关系密切一点。因为修辞学所用来研究思想和表现的关系的，多半就是文学的缘故。”^⑩确实，修辞学研究所采用的语料多半来自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的语言，往往经过精心锤炼，本身就比较典型，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因此，传统修辞学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现象、文学作品的评论，而评论作品的语言艺术，正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就与修辞学产生了交叉重合的关系。也由于修辞学乃是对语文的评议，它必须对文学例句中的语言运用进行评议。郑子瑜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中国修辞学史》的“绪论”和“结论”中，分别列专章论及修辞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他也认为：“与修辞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要算文学批评了。《文心雕龙》和刘知几《史通》大体上是文学批评的著作，但书中常有涉及修辞的地方。从前的人，每每把这两者混为一谈。”^⑪正因为这两门学科关系特别密切，研究的对象也如此接近，“从前的人，每每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就毫不奇怪了。但由此也进一步证明了陈望道观点的正确：在历史上，修辞学介于语言学和文学（文学批评）之间的性质格外明显。

修辞学既然呈现了边缘学科的性质，也决定了对它研究时不能局限于一门学科的方法。必须既吸收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也吸取文学、美学、心理学、逻辑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也要运用一般学科都普遍适用的方法，如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和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方法。中国修辞学在千百年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些研究方法。

修辞学史研究在分析、评判各个朝代、各个历史阶段的修辞评论时，经常会发现这些修辞评论往往与文学批评、美学评论、心理学评论、逻辑学评论、语法评论等混杂或融合在一起，尤其是古代，经常与经解、文论、诗论、随笔、杂记、诗话、词话、曲话等评论混杂或融合在一起。如能对修辞学的

性质特征有足够了解,就会正确认识和对待这种情况,就会在丰富的史料中运用修辞学的标准去爬梳扶剔,理出修辞学史的脉络来。这些现象交相混杂的本身,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修辞学带边缘性的学科性质。明乎此,对修辞学史与社会科学中多门学科的历史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研究修辞学史除了要熟悉语言学史及其分支学科如语音学史、词汇学史、语法学史(古代有音韵学史、训诂学史、文字学史等)之外,还要熟悉文学史、美学史、心理学史、逻辑学史、文章学史、演讲学史等,特别要研究文学批评史。对这些学科的原始资料、评判原则、研究方法等都要有足够的了解,从中受到启示。同样,修辞学史的研究成果,反过来对这些学科史也有着启发作用,它们存在着互补关系。

三、中国修辞学史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特色

二千多年来的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史有着自己的独特道路和民族特色,它与西方修辞学史有所不同,究其原因,也与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的影响有关。

(一) 社会需要的推动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重要工具,它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是社会构成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研究语言运用的修辞学必然要为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服务。千百年来,有关的修辞研究,就是不同社会的需要推动下,不断成熟的。

社会需要推动修辞学发展的适例很多。例如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诸侯割据,战乱迭起,兼并频繁。当时的统治者从自身政治利益出发,需要知识阶层的“士”帮助,需要他们施展说服、雄辩等才能,首先在外交活动中推行富国强兵的计谋。同时,由于不同流派、不同学术观点争鸣的需要,诸子百家无不重视舌辩和笔战。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修辞手法的妙用,于是,相应的修辞理论也就随之而生。人们逐渐认识到,修辞甚至

能在政治上起到安邦定国的作用。

社会的某些重要制度，也会推动修辞评论的发展。例如考试制度，唐代规定了以诗歌取士，诗歌进一步受到重视，诗歌的修辞研究有了发展，除王昌龄、皎然等人的著作外，晚唐五代还涌现了一批专门探讨诗歌写作技巧的专书，诗歌修辞理论有了发展。到了明清推行科举制度，以“八股文”取士，有关八股文修辞的理论亦随之盛行起来。所有这些都说明：社会需要对修辞研究起着推动作用。

（二）社会思潮的制约

社会思潮对修辞的影响同样很大。以复古征圣思潮为例，这一思潮在中国时起时伏，发挥过较大影响。其特点表现为：一是“则古称先”，迷信古代圣贤，把它们言论视为绝对真理，把古代经书典籍当作衡量真理的唯一准则。二是贯彻“述而不作”的原则，以注疏形式解释经书典籍。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古代许多知识界人士皓首穷经，以“则古称先”为荣，很少追求创新。清末思想家严复在《名学浅说》中指出：“中国由来论辩常法，每欲求申一说，必先引用古书，诗云子曰，而后以当前之事体语言与之校勘离合，而此事体语言之是非遂定。”修辞和修辞理论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在下列方面表现突出，一是经解修辞发达，对经书词语的训诂和语言运用手法的阐释评论着力较多。二是用事（引用）手法盛行，对用事的探讨比较深入。三是修辞手法和修辞理论研究上的创新往往大受束缚。即使像韩愈等提倡古文运动，其实质是革新，却不得不打出“复古”的旗号。在复古思潮泛滥的朝代例如明代，前后七子就明确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口号。明代的诗文修辞理论模拟较多，创新较少，均与复古思潮的影响有关，即使到了当代，“征圣”思潮有时还有一定市场。

（三）外来文化的激荡

修辞学作为社会文化的因素之一，一方面受本土文化的影响，一方面也受外来文化的激荡。历史证明外来文化对修辞研究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如佛教从东汉开始即传入中国，到了六朝和唐代而大盛。佛教徒在宣传教义、解